

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考察

钟小敏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产生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世界大背景中,且与政党建设相结合相伴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时局的变化和历史社会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建国方案和治国方略,形成了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创新的特点。人民共和国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人民共和国;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D25;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6-0005-0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的国家理论,为建立新型民主国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深入考察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艰难历程,深刻认识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对于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和独特功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国构想和实践准备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国构想产生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大背景下,且与建党相结合相伴随。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俄国苏维埃运动及革命政权模式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均对十月革命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宣传和介绍。1919—1920年,陈独秀指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他主张“劳动阶级以强力和阶级斗争铲除罪恶的国家”^{[1]4:7-10},建设新的国家,这个国家以“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

一需要”^{[2]371}。1921年8月13日和9月1日,蔡和森两次致信毛泽东,阐发他对建党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国家形式的观点,认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于全国的苏维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3]23}。毛泽东认为,蔡和森提出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本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4]4}。关于建立党的组织,毛泽东认为,“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这项工作极为紧要,且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员^①,人人注意及此,以至诚恳的心,联络人格光明、思想向上的各方人士,结为同心”^{[4]8}。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一个与一切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

收稿日期:2009-08-20

作者简介:钟小敏(1956—),女,四川成都人,史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建立起稳固的无产阶级政权,进而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取得统治的共和国。在建党和建国两者中,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创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决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5]33}。中共一大在党纲中首次肯定了“苏维埃”是党的一项组织制度,未来的国家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对未来国家形式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制定了两种建国方案。大会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5]114}。据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两种建国方案,其主要体现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中。指出:在目前阶段,党的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用阶级斗争手段,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正确的结合起来,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对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和前途做了正确的分析,对未来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作了简要而明确的表述,其建国构想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

根据二大的决定,1922年9月,党创办了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主要通过报道和评论时政,加强党的政策的宣传。陈独秀在《本报宣言》中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向导》周报的宗旨,即“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6],提出用“组织真正的国民军,进行国民革命”的方案来“创造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7]。之所以用“国民革命”一词来代替“民主革命”,陈独秀后来解释说,“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

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8]。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与18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使这个口号更易为全国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所接受,因而很快成为全国普遍的口号。1923年4月,毛泽东在创办《新时代》月刊发刊词中指出,本刊“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②。党创办的其它刊物,如《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中国工人》、《劳动周刊》、《中国青年》、《热血日报》等,大力引介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以丰富的报道内容、深刻的分析评说,发挥出最大的宣传效果,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个时期,党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策略方法;二是努力把政治宣传工作贴近现实、贴近群众,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积极扩大党的组织,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高潮积蓄力量。

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局部执政实践探索

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均把改造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国共两党改造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的一致性,使国共两党于1924年第一次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随之展开。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均试图以各自的政治理念、政治纲领、政治策略主导中国社会的改造,并试图改造对方,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共两党最终分道扬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当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已背叛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因此,目前中国革命应该仿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9]370}。在这一策略的推动下,从1927年11月开始,全国掀起了以攻占广州、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高潮。然而,在本身力量薄弱且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各地的武装起义屡屡遭到失败。事实表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模拟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一阶段的中国革命已走入绝境。在中国革命受挫的严重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经验 and 教

训,另辟蹊径,经过艰苦探索,最终开创了一条通过武装起义,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的革命的新道路。

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崭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公开打出苏维埃革命旗帜后始终追求的革命目标。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得到确认,会议认为它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直接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的唯一方式”^{[10]133}。随着各红色根据地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先后创建和红军的日益壮大,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目标有了实现的可能。经过一年半的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在江西瑞金上空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探寻发展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的新方案,其建国方案与局部执政探索具有如下重要特点。

第一,中华苏维埃运动突破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形式时,曾经提出过民主共和国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必然选择的重要设想。恩格斯指出,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家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政治形式,在我国社会条件下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选择。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日起,世界无产阶级就在为推翻剥削制度而努力奋斗,探索、寻找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民众利益的建国方案。经过巴黎公社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找到了这个政治方案,这就是工农苏维埃政权模式。在红色区域内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它的名称、形式和基本的指导思想都还保留着俄国革命的烙印,但中华苏维埃革命已经在城市中心论以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道路等问题上突破了俄国的模式,开始具有中国特色。

第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实践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在中国第一次解决了实质民主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

家,其政权实行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工农、红军兵士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级代表大会直至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自下而上选举产生。通过政治动员和社会教育,根据地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政治意识和参与热情大为提高,各地基层民众积极参加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均超过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80%以上。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体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诉求,保证了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政权并管理国家,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最重要的是广大工农群众懂得了政治参与的意义,参政能力大为提高,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最早的基层民主选举以及当今实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发端于苏区根据地。

第三,由民主方法和民主程序建立的乡、村苏维埃政权,最大可能地加强了上级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联系。与国民党依靠地主、地方士绅维持农村基层政权,造成许多地方的农民与国民党政府的隔阂和对立形成鲜明对照,苏维埃政府通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把广大的贫苦农民团结到自己周围,其干部或代表来自于当地的贫苦农民,又直接服务于贫苦农民,苏维埃的“最中心任务,就是使群众深切感受到苏维埃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11]291}。通过苏区社会最基本的行政组织,党能够深入乡村,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实现其对根据地社会资源的成功控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横跨十几省的苏区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政治实体,极大地扩大了中共在全国的影响,标志着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和工农政权建设发展到了极致。它不仅使大批干部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提供了广阔舞台,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 关于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案

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表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并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中国首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迅速把握了正在形成的新的历史主题,响亮地发出了将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的号召,并开始逐步调整自己

的策略方针。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将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将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2]157-158}这一策略显然更适合实际斗争的需要。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中共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一个能够抵抗外侮的,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包容更多阶级、阶层于其中的民主共和国,是“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现代化国家”^{[13]78}。中国共产党进而提出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一)与苏维埃共和国和国民党政府相比,中华民主共和国“是较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13]88}; (二)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在内;(三)建立“临时国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4]383,385}。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与政府制度”^{③[14]383},它必将加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华民主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形态,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在政体上,中华民主共和国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县、区直到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4]677}。这是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政经验的总结,亦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从政权构成上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实际上已接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形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再次表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向国民党作出了包括“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内的四项保证,并立即发布文告,停止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

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5]386},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容纳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民主政权。1941年,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边区政府保证根据地一切抗日人民享有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等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抗日民主政权及机关人员按照共产党员、党外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的“三三制”原则加以配置。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的内涵更加宽泛,地主、绅士、资本家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均被视为“人民”,不仅在经济上保证了个人私有的大部分财产,而且还恢复了公民资格,在政治上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些人还当选为参议员,进入中共乡村政权任职^{[16]117}。“三三制”从政权建制上凸显出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的内涵与实质。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及其政权特色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政治上成熟、斗争经验丰富、政策坚定正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局面,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容纳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4月,毛泽东所作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以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步骤。毛泽东指出:“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建立临时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为达此目的,“愿意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在一个民主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17]1069}。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所创造的党派之间协商的方式,关于未来执政的设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实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基石。

为适应抗战结束后国内政局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联合政权性质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组织形式也由“参议会制”向“人民代表会

议”制度过渡^{[4]248}，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形式以及实现民主的途径继续进行深入探索。

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接受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很快撕毁了同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一切协议，在制定新的国家实施计划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即将建立的国家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8]1273}。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新民主主义建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将它同苏联模式作了区分：（一）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阐释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明确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阐明了新政权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其“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展中国经济，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三）指明了建立新的国家的途径，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8]1471,1475}。上述一系列原则和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前两种国家形式相比，有显著不同的政权特色。

其一，在政治框架中排除了“多党竞选”和“多党轮流执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存在着既不同于共产党又不同于国民党、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势力。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既不能走旧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中间的改良道路，即所谓第三条道

路。抗战胜利后，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力量相对均衡的局面下，异常明显地活跃起来，并在一部分民主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国民党固然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打倒国民党”^④，国共两党力量相对均衡的时局正是中间党派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19]46}，他们号召一切中间力量，“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在时局斗争中起“决定的作用”^⑤。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在走什么样的道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根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但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和平民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方面有着共同一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建国方针，在抗战后期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以及争取建立联合政府而进行的民主运动中，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博大胸怀，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方民主人士的钦佩。他们发表宣言，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20]505}。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中国共产党日益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党的领导有了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血腥恐怖行为则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与各民主党派互动互信、平等的协商国是，同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开放性、合作性以及团结建国的精神。

其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并居于政治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大会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确定为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在民主革命时期就确定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建国目标。它与苏联政权模式

的最大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苏联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建立起一党专政。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这一制度既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五 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创新

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艰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理论与实践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在欧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运用到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情况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来,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以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为依托,为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并化为实践中的自觉行为这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国理论内涵丰富,其理论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学说,秉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方法,把政体作为国家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迅速把握时局的变化和历史社会提出的新要求,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多维度予以考察,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建国方案和治国方略,从而逐渐形成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时俱进和创新的品质。

其次,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为民主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21]315},而暴力革命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制度的途径。但是,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各地一次次武装暴动的失败,清楚地证明了在中国不可能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就可以形成全

国革命高潮。在中国革命受挫的严重关头,保存革命火种,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探索,最终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22]178},这在中外历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均无先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革命新道路的开创,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三,创建了具有鲜明的人民解放价值取向的政权制度。中国共产党从最初设想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到倡导成立“中华民主共和国”,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执政实践探索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其间,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政治主张,创造了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和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的“参议会制”、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实行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多种民主形式。尽管国家名称表述不同,建国方案有较大差异,实现民主的途径不同,但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的目标始终如一,其理论、纲领以及实践奋斗,反映了国家独立、民主、统一的历史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新社会的主人”^{[23]1},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历史巨变。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新历程。人民共和国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自觉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重大转变。

第四,构建了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框架。如果说工农苏维埃代表会议是舶来品,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多党派参与政权的“三三制”就完全是中国本土化的、为适应中国政治生态的政党制度提供的一种崭新的设计。“三三制”民主政权体现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尊重

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使执政党的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周恩来对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实质作了这样的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22]³⁶⁹。在党际关系方面,则体现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这是把现代政党制度的一般取向与中国民族性的特殊取向有机结合起来,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又区别于苏联一党制,是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大优点,是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利于扩大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和相互监督,达成最广泛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实现利益综合以及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

注释:

- ①会员,指新民学会会员。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1920年,部分会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与了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 ②转引自: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7页。
- ③参见《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 ④⑤转引自:王干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48页。

参考文献:

- [1]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1919-04-20)[M]//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
- [2]陈独秀.谈政治(1920)[M]//独秀文存.芜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3]蔡和森文集(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 [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陈独秀.本报宣言[N].向导,1922,(1).
- [7]陈独秀.造国论[N].向导,1922,(2).
- [8]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N].向导,1925,(128).
-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10]八七会议[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
- [11]张闻天文集(一)[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 [16]陕甘宁边区参议会[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 [2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9[G].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3]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凌兴珍]